

# 不盲从,才不会被焦虑绑架

我们时常被“裹挟”于社会事件和情绪中,成为“群体”的一部分,接受它的改造和同化。

当一个网帖告诉你, 得为养老准备300多万元时,你可能当作趣闻看。可当QQ群里的聊天、微博的议题、媒体的讨论,都在“拓展”这一话题时,你是不是就迫不及待的存款有几位数,怎样才能赚够这笔钱,而且开始为几十年后的退休生活担忧?

生活里的焦虑烦恼,有多少因为他人的言行引发?类似“80后退休前需准备314万元退休金”之类的“焦虑帖”,为什么时不时“走红”?尽管它可能夸大其辞,甚至“莫须有”,为何却被认可与接受?

确实,现实环境中,年轻人面对很多的压力和冲突——升学、就业、买房、结婚、生育,都是逃不掉的关口。迅速变革的社会,不断加剧的竞争,物质主义的流行,以及各种大行其道的潜规则,增加了生活的不确定性,让本该自由张扬的青春日渐窘迫。网络的方便快捷,为宣泄提供了自由廉价的通道,“焦虑帖”随之盛行,而这种宣泄又带有普遍性,很容易引发共鸣,被不假思索地接受和转发。于是,在舆论有意无意的推波助澜下,焦虑慢慢在扩散中被放大。

《中国青年报》的一项调查显示:68.8%的受访者认为当下“焦虑帖”泛滥;55.9%的人认为“焦虑帖”的



## 恐怖的『美德』



有一年,泰国发生饥荒,应候建议开仓放粮。泰昭襄王表示:“泰法赏罚严明(‘有功而受赏,有罪而受诛’),如果开仓放粮,饥民无论是否有功,都能得到赏赐,这会导致混乱。与其开仓放粮导致混乱,不如为了安定团结而放弃救济。”另一种说法是,泰昭襄王说:“开仓放粮会导致饥民无论有劳和无功,互相争夺,与其让他们活着但乱象丛生,不如为了安定团结让他们死掉。(‘夫生而乱,不如死而治’)”

《韩非子》的这个片段,充分体现了君主的“美德”:以法治国,法大于情,赏罚严明,稳定压倒一切。但是,这些“美德”推出一个恐怖的结果:宁可饿殍遍野,也不能开仓放粮。理由非常光明正大:与其“生而乱”,不如“死而治”。

泰昭襄王似乎很有法治精神,即使拒绝开仓放粮,也要把“泰法”当做挡箭牌,让人无从反驳。不过,这建立在泰法即王法的基础上。法治的核心要义是限制君主和政府权力,保障公民权利不受侵犯。但是,在法家这里,王法的核心要义是维护王权。

两者虽然都很注重“维权”,但法家重在维护政权,法治重在维护人权。

法家之“法”,与法治毫无关系,更接近董宗羲所说的“非法之法”。法治

泛滥,会降低青年的幸福感。当“焦虑”蔓延成一种社会情绪,它就像流感病毒一样,让人一不小心就中招,成为被感染者的同时,也成为感染源。

于是,人人都成了“焦虑症”患者。一个刚进大学的新生,忧心的不是专业成绩,而是毕业后能不能找到好工作,能否买得起住房;一个刚入职的年轻人,关注的不是业务能力的提升,而是职场潜规则;一对恋人,研究的是“学区房”,为想象中的孩子未雨绸缪……人们过多地为“虚拟”事件担忧,已然影响了每个人的态度、看法和决定。

都在对抗焦虑,又在不知不觉中传递焦虑;都想摆脱不安,却在裹挟中身不由己。个体很难改变社会环境,也很少有人能够超然世外、特立独行,“群体”的影响在所难免。只是,我们在接受“同化”之前,是不是该有所选择和判断?焦虑中“自救”的方式,是对人云人亦云的质疑,不在众说纷纭或者众口一词中丧失理性。

每一代人,都有自己的焦虑,每一代人,也都在突破困境。不妥协,才能不被改造;不盲从,才能不被绑架。你无法左右社会情绪,却可以改变自己的态度。许多“诉苦”不过是撒娇,又何必当真?

(摘自《中国青年报》7.20 冯雪梅/文)



丹麦首相拉斯穆森在今年2月份出访秘鲁,就在出访之前,他突然感觉自己的腿不舒服,走起路来很难。

于是,在2月14日,他驱车前往离首相府较近的哥本哈根大学医院看病。这是丹麦一家医疗设备非常齐全的著名医院,什么人都在这里看病,这里也根本不存在VIP专属区。

拉斯穆森将车停在了地下车库后,就来到了医院挂号处。他看到这里排起了长长的队伍,拉斯穆森就站在队伍后面排起了队。为了消磨时间,拉斯穆森从包里拿出一张当天的报纸看了起来。其间,他还从口袋里拿出手机,低声细语地接了几个电话。

有人从他身边经过,看到首相到医院来看病,有的向他点点头,有的向他问个好,还有的和他寒暄几句。人们看到首相来看病,就像看到一个普通的熟人,或者是一个邻居,一切显得都那么习以为常。这种情景,对于他们来说,太平常了,平常得就像看到日出日落或是花开花谢。

终于排到了。拉斯穆森挂了号,找到了看病的医生。

可是,找医生看病的人很多,拉斯穆森又只好在



## 要命的级别

有人对级别的认定到了要命的程度。在机关,在行政伦理上,在会议席位先后上,在花名册排列上,排列不对人就窝火。这例有情可原。在机关里,在单位里,这叫行权,我们可以无条件承认和接受它的级别,你说一就是一,你说二就是二,官大一级压死人。级别就是真理,级别就是有理,机关里,单位里,全是级别说话,级别才有发言权,没级别别说话。凡事论级别。比如我单位,新盖办公楼有新设计,一层楼里科级以下近百男人用一个卫生间,两个小便池,两个屎坑,副处级以上每人占一个卫生间,这个你不要攀比,因为在机关在单位就是讲级别的,级别越高越能尿,而且卫生间就设计在办公室套间里,拉屎撒尿不用出门——这就叫级别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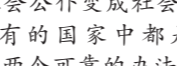
有一年,因为交通不便,中午不回家,在单位里又没地方休息,当时还没有QQ能网上下棋,我发现有人在电脑上下象棋,觉得不错,正可打发中午的时间,我就找微机室的人也给我装一个这样的软件。微机室的人说:“咱单位有规定,只有科级以上才能装这个游戏。”这是哪个混蛋出台的这样的规定?拉屎尿尿论级别,中午时间电脑上下盘棋也要论级别吗?

可恶的是模仿级别,把级别模仿到生活里来。我有一回吃喜酒,和我们单位一位科长去得有点晚,转

人民该如何制约监督国家权力呢?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,首先就是要人民普遍参与立法。人民普遍参与立法,不仅是使法律反映人民共同意志的手段,还是人民行使政治权利,实现政治权利的有效途径。因而,马克思对1831年《黑森宪法》给予了高度评价:“没有哪一部宪法对执行机关的权限做过这样严格的限制,在更大程度上使政府从属于立法机关,并且给司法机关以如此广泛的监督权。”

其次,普选制、撤换制、低薪制是人民制约监督国家权力的有效方式。普选制“把一切政治权力集中于人民议机关之手”。人民“应当以宣布它自己所有的代表和官吏毫不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,来保证自己有可能防范他们”。恩格斯在1891年为《法兰西内战》单行本写导言时,总结了巴黎公社的两个根本措施:“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——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——公社采取了两个可靠的办法。第一,它把行政、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,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。第二,它对所有公职人员,不论职位高低,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……这样,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代表机构的代表签发限权委托书,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。”当然,在今天,我们不可能教条式地全部照搬巴黎公社原则,但其中所包含的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的深刻思想,无疑值得我们深入研究。

(摘自《学习时报》毛益民/文)



外面走廊椅子上坐下等候。

过了好一会儿,终于轮到了拉斯穆森。

医生照例询问了他的病情,并查看了他腿上的病情。然后,医生对他说:“问题不大,一个星期后,我给您做个小手术,很快就会好的。”

拉斯穆森听了,脸上露出为难情绪,说道:“医生,能不能给我提前做个手术,一个星期后,我还有个重要的外事活动。”

医生说:“这哪行啊,总有个先来后到呀,再说,谁没有事呢?您有事,别人也有事,如果您先做了手术,那不是不公平了吗?”

拉斯穆森听了,面露愧疚的神色,连声说道:“那是,那是!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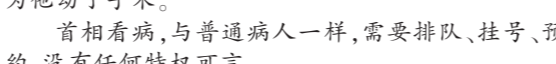
拉斯穆森一瘸一拐地离开了医院。

为了不耽误访问行程,拉斯穆森忍受着腿疼,坚持出团访问。

回国后,他找到了医生,按照事先的约定,医生为他动了手术。

首相看病,与普通病人一样,需要排队、挂号、预约,没有任何特权可言。

(摘自《羊城晚报》6.28 李良旭/文)



人民该如何制约监督国家权力呢?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,首先就是要人民普遍参与立法。人民普遍参与立法,不仅是使法律反映人民共同意志的手段,还是人民行使政治权利,实现政治权利的有效途径。因而,马克思对1831年《黑森宪法》给予了高度评价:“没有哪一部宪法对执行机关的权限做过这样严格的限制,在更大程度上使政府从属于立法机关,并且给司法机关以如此广泛的监督权。”

其次,普选制、撤换制、低薪制是人民制约监督国家权力的有效方式。普选制“把一切政治权力集中于人民议机关之手”。人民“应当以宣布它自己所有的代表和官吏毫不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,来保证自己有可能防范他们”。恩格斯在1891年为《法兰西内战》单行本写导言时,总结了巴黎公社的两个根本措施:“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——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——公社采取了两个可靠的办法。第一,它把行政、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,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。第二,它对所有公职人员,不论职位高低,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……这样,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代表机构的代表签发限权委托书,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。”当然,在今天,我们不可能教条式地全部照搬巴黎公社原则,但其中所包含的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的深刻思想,无疑值得我们深入研究。

(摘自《学习时报》毛益民/文)

这个时候,许家屯害怕了,他给中央发电报建议迁址,说否则的话还要闹得更大,签名要到达50万人了,小平同志很不高兴说:他们那么一闹,你就迁址,如果将来再搞个签名运动反对香港回归你怎么办?你也让?把他给驳回去了。我记得那时候是夏天,赵紫阳在北戴河传达小平的指示,我当时在场,许家屯也参加了。赵紫阳讲到,小平说不能让步,其实签名的人多一点少一点都不是一回事,没有甚么了不起的。结果顶住了,也没事了,闹了一阵子

就过去了。

中央本来让我在1989年年底就去,可当时许家屯不愿回来,说调他走可能会引起香港股市波动。中央领导人认为他提出的理由非常可笑。我提出是不是过了春节我再去,给他点时间。过了春节,我上任之前,先到深圳。许家屯还有几个副社长,一个一个过来介绍情况。这个期间新华社就公布了任免情况,香港股市一点波动也没有。

结果,许家屯就赖着不想走,他说:不让我在香港,我就在深圳住下来,我还要研究香港的问题。中央没有同



前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出版的新书《周南口述:遥想当年羽扇纶巾》,披露其前任,即前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于1990年突然退休并出走美国的内幕。以下为有关内容节录:

**骗得中央一亿美金,结果亏了公家肥了自己**
许家屯贪图物质享受,到了香港这花天酒地的地方,很快就投降了。他向赵紫阳要一亿美金,说是要按香港方式办企业,取得经验。他组织了一个公司,把自己的亲属都塞进去了,结果公司破产,亏了公家,肥了自己。

后来,各方面对他反馈的意见到上面,大概是1987年,反映给姬鹏飞,就让他回来,开过一个小时,港澳办的人给他提意见,我也参加了。每次会议还出简报,他很紧张,以为要撤他。后来又发生了几件事情,一个是大大亚湾核电站,那时候有的国家的核电站出了点事故,但是总体上是安全的。香港的一些人就趁机鼓噪,说大大亚湾离香港太近,出了事故会殃及港人,搞签名运动,说签名人达到了多少万了,向我们施加压力。

这个时候,许家屯害怕了,他给中央发电报建议迁址,说否则的话还要闹得更大,签名要到达50万人了,小平同志很不高兴说:他们那么一闹,你就迁址,如果将来再搞个签名运动反对香港回归你怎么办?你也让?把他给驳回去了。我记得那时候是夏天,赵紫阳在北戴河传达小平的指示,我当时在场,许家屯也参加了。赵紫阳讲到,小平说不能让步,其实签名的人多一点少一点都不是一回事,没有甚么了不起的。结果顶住了,也没事了,闹了一阵子

就过去了。

词作者只有13岁

据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歌词作者金果临说,在他当年的小笔记本上清晰地标注着,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这首诗词创作于1969年11月29日,那一年金果临13岁,是上海市常德路第二小学五年级学生。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是他创作的第13首作品。那时候他刚开始诗词创作,并且已经在当地的少儿刊物上发表过两首作品,热情很高。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,最初来源于当时英语课本中的两句内容:“我爱北京,我爱天安门”。

曲作者金月苓是在1970年出版的第三期《红小兵》上读到这首诗词的,在完成谱曲之前,她并没有和金果临商量过。那一年她19岁,是上海第六玻璃厂的一名普通女工。金月苓喜欢音乐,每逢下班休息在家,她便坐在饭桌前写歌。

金月苓和金果临有一层特殊的姐弟关系:他们的母亲是一对亲姐妹,而他们的父亲又是一对亲兄弟,因此彼此间既是堂姐弟关系,又是表姐弟关系。

**三年后才正式定稿**

在歌曲发表的最初三年,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经过几次修改。

在金果临的笔记本上,这首诗词最初的题目是《金光照的全球红》:“我爱北京天安门,天安门上太阳升,太阳升起金光照,金光照的全球红!”正式投稿时,他将最后两句改成“太阳光辉照万里,祖国山河处处春”,题目也被更名为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。作品发表时,编辑将最后两句改为“太阳就是毛主席,光芒万丈照前程”。在1971年10月1日,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这首歌词时,歌词又改为“伟大领袖毛主席,指引我们向前进”,这便是今天人们耳熟能详的版本。和歌词一样,曲谱也改了两三次。1972年,这首歌曲在诞生三年后才正式定稿。

**当年每人获奖17.5元**

据金月苓回忆,1972年4月23日,《人民日报》刊登了10首歌曲,其中便有这首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。一个星期后,当年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制的《北京“五一”游园会》专题节目中,出现了孩子们伴随着这首歌曲欢快起舞的场面。从此,几乎每个省市都在出版或转载这首歌曲,但是没有任何稿费,只有两本书而已。

1980年,这首歌曲获得“第二届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”二等奖,两人才领到一笔奖金:每人17.5元。(摘自《北京广播电视台报·人物周刊》金月苓/文)

# 周南披露许家屯外逃美国内幕

就过去了。

**荒唐建议让英国缴钱租港**

第二个是“八九政治风波”之后。英国人策动一些人找许家屯提了一个荒唐的建议,说香港不要急着收回,还是让英国继续管治,香港方面设法继续筹钱,给中央一年十几个亿,或者更多一些献纳,搞变相的租借。这不是等于中英《联合声明》作废了吗?但许家屯居然在内部讲这是个“大政策”,并反映给北京,中央很恼火。许家屯在“八九政治风波”的过程中又搞了一次政治投机,搞得香港的我方人员思想很混乱。在他的影响下,我们报刊言论的激烈程度甚至超过了一些反华报刊。当时国务院港澳办公室有一位副主任李后,在他的《回归的历程》书中有一段

写到许家屯,“他个人专断,在许多重大问题上,擅自对外发表意见和采取行动,在组织上怀有浓厚的宗派情绪,培植和安排亲信,排斥和打击持不同意见的干部,结果弄得民怨四起,便有香港工作的干部,纷纷向北京反映对他的意见。”这时中央考虑许家屯已73岁,年龄过线了,就决定调他回来。

中央本来让我在1989年年底就去,可当时许家屯不愿回来,说调他走可能会引起香港股市波动。中央领导人认为他提出的理由非常可笑。我提出是不是过了春节我再去,给他点时间。过了春节,我上任之前,先到深圳。许家屯还有几个副社长,一个一个过来介绍情况。这个期间新华社就公布了任免情况,香港股市一点波动也没有。

**私办不带官衔红皮护照**

结果,许家屯就赖着不想走,他说:不让我在香港,我就在深圳住下来,我还要研究香港的问题。中央没有同

许多领导同志工作之余都有一些爱好,周总理爱跳舞、看越剧,陈老总爱下围棋。周扬的业余爱好,好像除了开会就是变相开会的谈话。

1984年秋,周扬病势渐沉,躺在医院里起不来,脑血管障碍使他经常说错话。

有一次王蒙去看他,告辞时另一探望者向王蒙何时在京西宾馆召开文艺座谈会,周扬眼睛一亮:“什么会?”口齿不再含糊,语言再无障碍,目光如电,恢复了严肃精明乃至有点严厉的审视与警惕的表情。王蒙回忆说:“这是我最后一次在他清醒时与他见面的一面,他的突然一亮的目光令我终身难忘。”这道因“开会”亮起的目光,使王蒙刻骨铭心,数年后成为悼文标题

《周扬的目光》。

那人 (摘自《书屋》)

许多领导同志工作之余都有一些爱好,周总理爱跳舞、看越剧,陈老总爱下围棋。周扬的业余爱好,好像除了开会就是变相开会的谈话。

1984年秋,周扬病势渐沉,躺在医院里起不来,脑血管障碍使他经常说错话。

有一次王蒙去看他,告辞时另一探望者向王蒙何时在京西宾馆召开文艺座谈会,周扬眼睛一亮:“什么会?”口齿不再含糊,语言再无障碍,目光如电,恢复了严肃精明乃至有点严厉的审视与警惕的表情。王蒙回忆说:“这是我最后一次在他清醒时与他见面的一面,他的突然一亮的目光令我终身难忘。”这道因“开会”亮起的目光,使王蒙刻骨铭心,数年后成为悼文标题《周扬的目光》。

那人 (摘自《书屋》)

1973年,老伴李普和我从广东调到北京。李普在新华社北京分社任社长。北京分社没有宿舍,几经周折,好友张铁夫为我们找到了月坛北街五号楼的宿舍。

我们住的四层的楼,还有一套房子,是三间一套,他们的房门对着我们两间一套的房门。我们这位邻居叫叶子龙,

是大大有名的跟随毛泽东多年的秘书。我两家两家的房门常常是敞开的,互相常来往。叶子龙那时还没有“解放”。他身强体壮,精力旺盛,很会生活,又健谈。那会儿时兴称呼“师傅”,我们都叫他叶师傅。

有一天,他问我愿不愿意帮他一个忙。我原以为是什么生活上的事,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忙,他要我帮他写一份检讨。检讨什么呢?他说,很简单,就是检讨窃听器的事。我完全不知道窃听器是怎么一回事。叶师傅告诉我,完全不是什么窃听器。那时,中央开会,或毛泽东找人谈话,毛的讲话都要记录下来,有时听不清、记不下,中办的人商量安一个小小的麦克风,把老人家的讲话录下来,然后按录音整理记录。过了一阵,被毛发现了,这就成为私自安装窃听器的大事。这事涉及的人很多,我叫叶师傅,该怎么检讨。他说,不牵扯别人,只说我不对就行了。我按他的要求,字斟句酌地写了一份检讨,叶师傅居然还相当满意。

我们住的五号楼的五层楼上那时还有两套房子没人

# 周南披露许家屯外逃美国内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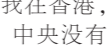
意,说南京已经给你搞好房子了,还有车。你愿意到北京住也可以,要回南京也可以。他是南京来的,就不要在深圳了,中央也怕他干扰我们那边的工作,他更不满意了。事先他就把带官衔的红皮护照交了,回来之前又找外交部驻港签证处要了一个不带官衔的红皮护照。后来签证处批给他了。为什么给他?他说当时中央有特殊任务给他,签证处也不知道。

**送走元配 与“二奶”飞美国**

我已经上任几个星期了。有一天,他在深圳把夫人骗走了,跟他夫人讲,车票定好了,我今天晚上送你去车站,你先回南京,行李也带去。我还要跟香港两个客人谈话,一两天之后我也回去。

但是,送走了自己的夫人以后,许家屯当晚就和他的姘头一起逃跑了。连他的孙女都看透了他,后来公开向香港传媒批评揭露了他,并说:“他这个人很不老实。”香港那边有什么人接应许家屯呢?有一个已为西方反华势力收买的人接应他去了美国洛杉矶。据说,到了那里,许家屯又出卖国家机密,中央很快对他开除党籍。

许家屯的出逃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。那时候香港舆论一片哗然,反华势力又利用这一件事对我们施加各种压力。1990年,“八九政治风波”一周年的时候,据报道,有几十万人游行,有一部分反华势力在新华社门口,拿个大床单,写着“周南应向许家屯学习”几个大字。我说:向他学习?那我不是成了叛徒?别做梦了!还有人向我们的新楼打了黑枪,幸好没伤人,叫港英政府追查,始终没有下文。



## 互联网第一张图片 系四美女合影

今年7月18日是互联网上第一张图片20周年的日子。如果以现今的观点来看第一张上传到互联网上的照片,可以用“Photoshop灾难”来形容,不过这在当时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。

该图是Les Horribles Cernettes女子乐队的一张宣传海报,由万维网发明者蒂姆·伯纳斯李在20年前上传,图中的4位女成员中不仅包括CERN(欧洲粒子物理研究所的简称)的行政人

员,甚至还有CERN日内瓦粒子物理实验室的女科学家。这张具有历史意义的相片拍了CERN1992年7月18日举办的强子音乐节(Hardronic Music Festival)后台。(摘自《深圳特区报》7.12 苏然/文)



住。有一天,有人来看五楼的房子。叶师傅说,来看房的人是北京市第一书记兼市长吴德的秘书。然而,搬来的却是一对老年夫妇。

叶师傅消息灵通,他告诉我们:新来的邻居是现任毛泽东的秘书张玉凤的双亲以及她丈夫的弟弟。新的邻居搬

来以后,五号楼就显得更热闹了一些。最忙的是叶师傅。他时不时以各种借口,跑上五楼去视察一番;然后来告诉我们,五楼又添了什么家具,什么颜色,放在什么地方等等。有一次,他从五楼下来,对我们说:“毛主席现在在湖南。”我问他是怎么知道的,他说,张玉凤给家里捎来一条羊腿,包羊腿的报纸是《湖南日报》。

贺龙的儿女贺捷生也住在月坛北街,她夫妇两人和叶师傅熟识,因此也经常到我们家来。贺捷生忙的是另外一件事。影片《创业》给“四人帮”枪毙了,贺捷生动员作者给邓小平写信,要求邓小平重审。这事显然是针对“四人帮”的,非同小可。信如何写法,自然要反复推敲,各方征求意见。贺捷生告诉我,她曾对作者说,这事搞不好有可能坐牢。她问作者敢不敢冒这个危险,作者甘愿冒险生事。作者也支持写信。贺捷生告诉我,她曾对作者说,万一作者要坐牢,她一定去牢房送饭。经过这一番努力,《创业》终于上演了。(摘自《红色记忆》沈容/著)



那时